

中共党史研究的史料与史学*

黄正林

[摘要] 尽管目前中共党史研究的文献整理和对党史问题研究的深度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在史料方面仍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史料应该多元化,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研究,要关注国民党方面及海外的资料。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要强调其“史学”的属性,扎实的学术研究是党史教育与宣传坚实的基础,讲好党史故事才有根基。

[关键词] 中共党史; 文献多元化; 学术研究

[中国分类号] K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08(2022)05-0015-05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际,中共党史研究与宣传势头超越了以往任何时候。一是从中央到地方开展了大规模的党史宣讲活动,重温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奋斗历程,进行了一次普遍的党史教育;二是党政部门、研究机构 and 高等学校举办了各种级别的学术会议,有全国性的,有地方性的,有区域党史研究,也有人物纪念等等,不一而足;三是出版或再版了各种著作,包括党史宣传教育、学术研究以及党史文献等;四是各种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开辟党史研究专栏,一些过去从不发表中共党史研究论文的专业学术期刊,也设立栏目发表中共党史文章;五是党史影视作品也再度热播,不仅重播了过去的党史影视剧,还有大量的反映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影视剧播出,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广播、电视台开设各种专题节目,讲党史学党史。六是不同学科发挥各自学科特长,在研究、学习、宣传党史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如美术界有许多宣传画、漫画出版;音乐界创作、翻唱了许多革命歌曲。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党史学习和研究的特色,是一次真正把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深入人心的活动。在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之后,回过头来冷静思考中共党史的学术研究,还有许多基础工作要做。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从如何扩展中共党史研究的“史料”和“史学”角度,谈谈自己粗浅的想法。

一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在目前党史研究领域却是一个不得不说的话题。关于中共党史的学术研究,从党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而言,至少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几个阶段的史料出版、学术研究比较成熟了,既有比较深入的理论、方法的探索,也有对许多重大问题的研究。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大陆从业学者每年出产的论著是最多的,但能够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影响力和获得话语权的并不是很多。如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研究,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今发表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力难以与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相提并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陕甘宁边区制度史研究”(15ZDB042)的阶段成果。

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史料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是石川祯浩耗时十数年完成的著作,收集了日、中、俄、美等国的大量资料,搜集当时的报刊、当事人的日记和回忆录、多国学者相关研究文章,“更有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档案、日本内务省警保局档案、中共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俄国社会政治史(原俄国现代史资料保存中心)资料、俄罗斯解密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有关档案以及私人收藏文献等第一手史料。尤其是作者还首次披露了一些原来无人利用的档案史料”^①。就其史料引用和考证,学术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其史料运用之丰富、史实考证之细密是以往同类专著中颇为罕见的”^②。因有扎实的史料基础做支撑,该书一经出版就成为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问题的经典之作。

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存在一种现象,研究者在抱怨资料缺乏的同时,对已出版的资料引用率却比较低。其实,在中国现代史学术研究中,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整理和出版的文献应该是非常丰富的。从上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成立后,从省到县相继成立了同类机构,开始大规模搜集、整理、编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文献,不仅整理出版各种馆藏文献,而且做了大量口述、田野调查以及编辑出版各种党史资料通讯。中央档案馆与各省档案馆合作,编辑出版“革命历史档案”文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研究机构、高校、政府部门、党群机构也参与到党史资料整理中。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期,在党史文献整理方面取得的成绩,可谓蔚为大观。以陕西为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后改为党史研究室,下文简称“党史征研委”)成立后出版了内部刊物《陕西党史资料通讯》,各地市也分别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党史资料通讯”,披露刊登了大量的原始文件。如1933年7月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被捕叛变后所写的自首书《陕西共党沿革史》部分内容在《陕西党史资料通讯》上披露,成为研究陕甘党史和红二十六军历史比较珍贵的资料。“党史征研委”还陆续编辑出版“陕西党史资料丛书”43种,涉及到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在陕西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共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主持编辑出版了《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21册。各市党史征研委也编纂了一定数量的地方党史文献,以大革命前后农民运动和起义为例,咸阳市征研委有《大革命时期咸阳地区党团组织建立及活动》《大革命时期咸阳地区农民运动》《秋步月传记·回忆·诗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咸阳地区党组织》等;渭南市征研委有《大革命时期渭南农民运动》《渭南地区早期党团组织的创建发展及其主要活动》《渭华起义中的区村苏维埃政权》《陕西党的工作的新纪元——宣化斗争》等。此外,县级党史部门也完成了一定数量的县域党史资料。上世纪80~90年代各省市党史征研委(党史办)整理出版的各种党史资料除了搜集档案文献外,最大的亮点是采访了一些健在的当事人,形成了弥足珍贵的、极具学术价值的“口述资料”。笔者就是利用这些口述资料并结合档案文献完成了《中共革命、农民运动与渭华起义研究》一文。

从中央到地方党史部门编辑的党史资料存量很大,但从目前研究状况来看利用率不高。究其原因,一是这批资料流传不广,尤其县地(市)级党史部门编辑的资料大部分是内部资料,甚至有相当部分是油印本(还有蜡版刻印本),没有公开发行,即便图书馆、档案馆也未能完整保存,存世较少,大多不为研究者所知。二是一些党史研究者只求发表文章的数量,不求质量与学术水平,故不搜集、也不阅读已出版的各种原始文献,只做低层次重复工作。因此,中共党史研究扩展史料首要的问题是把以前编就的各种资料梳理清楚,这对中共党史研究尤其是初学者而言是必须要做的基础性工作。2021年《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推动组织各地对1978年以来中共党史文

① 占善钦:《一部精心考证的创新之作——评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4期。

② 李丹阳、刘建一:《新视野下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研究》,《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

献书目的整理，在“中共党史研究公众号”上发表，包括《四十年来有关中共创建史文献资料要目索引》（张会芳整理）、《四十年来有关中共西北地区历史文献资料书目集萃》（郑康奇整理）、《四十年来中共西南地区历史文献资料书目集萃》、《1979年以来中共东北地区革命史文献资料书目集萃》等。这些基础性工作的目的就是扩展研究中共党史资料的来源，唤醒一些“沉睡”的资料，以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正如该公众号为中共西北地区革命史研究论文索引所写的“编者按”之所言：“以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为中心的中共西北地区革命史研究，拥有相当‘漫长’的发展历史，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颇为浩繁，但近些年来也的确存在着学术边际效益递减、学术创新不足等问题。如何透过这些研究成果的学术史梳理和分析，审视以往研究成果和学术格局存在的不足，进而推动中共西北地区革命史研究的学术创新，就成为相关研究者需要考量和思虑的基础问题。在我们看来，未来的中共西北地区革命史研究需要加强整体性、综合性的‘问题导向研究’，突出作为一种地理空间和时空脉络的‘西北地区’自身的历史‘特殊性’，突出西北地区在整个中共革命历史进程中的‘特殊性’，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去中心化’以及‘重新中心化’等等，都值得历史学界展开更深入的讨论。”^①由此说明对已有资料阅读、利用不足是大家的共识，也说明重提对已有资料的阅读对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是有意义的。

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史料扩展，另一个方向是利用不同党派派系所形成的文献相互参证进行中共党史中某些重大问题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主要与国民党、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在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中不能没有对手存在。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凡是有学术分量的研究著作都会搜集、利用各方形成的文献。如杨奎松的《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路》等研究中共党史的经典作品，是国内中共党史学者比较早的破除“资料壁垒”的学者，即除了使用大陆研究机构所编以及中共方面形成各种资料外，还征引了一定数量的海外资料，包括曾经的对手国民党方面的资料。尽管在当时条件下国民党方面的资料利用比较少，但已经为中共党史研究资料扩展开创了先河。在中共党史研究已经比较成熟的今天，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和解释，越来越需要对国民党以及与涉及中共革命相关的国家、党派、人物、机构资料的重视。如旅美华裔学者吕彤邻近些年致力于编纂“外国观察者眼中的中共抗战：美军观察组延安机密档案”一系列资料，中央档案馆也编辑出版了《中央档案馆馆藏美军观察组档案汇编》。随着这些资料的出版，已经出产了相关成果，如吕彤邻的《美军观察组延安报告中的日本工农学校》（《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7期）、诸葛蔚东等的《延安时期中共对日宣传策略研究——给予美军观察组〈延安〉报告的考察》（《党的文献》2020年第4期）。这是已经整理出版的资料的利用，还有大量资料沉睡在档案馆里。笔者最近几年曾尝试指导博士研究生利用国民党方面形成的资料对全面抗战时期国共在陕甘宁边区摩擦的“老问题”进行研究。博士生赵赫依在庆阳市档案馆、甘肃省档案馆查阅了上千卷国民党甘肃省府、甘肃省第三督察专员公署、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和天水行营档案，撰写了《抗战时期环县事变再研究》一文，利用了上述档案文献重新解释了发生在1939年底至1940年初的“环县事变”。1936年6月，红军西征推翻了国民党环县政权，建立了中共环县政权，但因西安事变后中共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使该县没有彻底进行土地革命，也没有肃清流窜在环县、宁夏交界处的土匪以及哥老会的势力。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国民党第三督察专员公署利用当地土匪、哥老会的势力重建了国民党环县政府，这些档案文献充分说明天水行营、甘肃省当局和第三区行政策划了国民党军队“在陇东地区的政治与军事活动，极力压制中共陇东政权的发展

^① 见“中共党史研究公众号”2021年5月30日。

或把八路军赶出陇东地区”。根据天水行营、甘肃省府指示，国民党环县政府制定《环县政府工作纲要》，并规定由“国民党环县县长、县党部书记张和保安大队长负责实施”^①。通过这些国民党方面的文献，再次证实了国共两党的摩擦的确是国民党方面一手策划的。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尤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的研究，国民党方面所形成的资料十分重要，应该说是中共党史研究文献的主要组成部分，缺失了这部分资料，许多问题没有办法说清楚。

当然，用国民党方面形成的文献研究中共党史并不是易事。一方面，中共党史研究资料的拓展取决于档案开放的程度。2021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档案馆的档案，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二十五年向社会开放。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类档案，可以少于二十五年向社会开放；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可以多于二十五年向社会开放。国家鼓励和支持其他档案馆向社会开放档案”。然而众所周知，国内各级档案馆档案开放利用的程度并不尽如人意。许多档案馆为了省事，只采取“一刀切”的方式，一句“上面有规定不能看”就把查档者拒之门外。如果档案馆依照该法开放档案，学者依照该法使用档案，必将推动中共党史的研究和宣传。另一方面，中共党史研究资料扩展取决于杂志编辑视界。笔者几年前研究中共中央转战陕北以及与国民党在陕北战场的较量的问题，国民党方面形成的资料是绕不过去的，于是查阅和利用了《胡宗南日记》《蒋介石年谱》等资料，但文章发表时编辑建议将这些资料大量删去。实际上，从《胡宗南日记》等文献中能够反映出国共两党军队在陕北战场的较量中，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无能，能够解释中共为什么在这场较量中取得胜利的原因。因此，中共党史研究资料扩展是研究者和出版机构编辑面临的共同问题。

二

关于中共党史的史学研究，就其方法论、视角等前贤已经有十分精辟的论述。如张静如在党史学历史理论和方法问题上，提出了七个方面和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②。这些观点和见解无疑对推动和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有重要的意义。近十余年来，李金铮对革命史（重点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史）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倡导革命史研究重视“常识”“常情”“常理”。尽管“新革命史”作为学术讨论受到陈红民、毛升等学者的质疑^③，但“新革命史”的理念、方法和提倡的学术精神，已经在中国现代史和党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近十年涌现出许多新成果就说明了这一点。如青年学者齐小林的《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尽管如此，对于中共党史史学研究而言，依然有许多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高质量中共党史学术研究是党史宣传教育的基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开展了大规模的学习和宣传中共党史的活动。但在一些地方和基层党史宣传教育中，特别是举办的展览和纪念馆存在各种不足，甚至出现张冠李戴和史实性的错误。为何出现这样的不足？主要原因是中共党史学术研究没有跟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有的党史论文，包括博士论文，仍充斥着一种特殊的‘八股’叙事气息，浮于表面、大而无物、重复劳动，几无

^① 赵赫依：《抗战时期环县事变再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1期。

^② 张静如、王炳林：《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回顾与思考》，《北京党史》1999年第2期。

^③ 陈红民：《“新革命史”学术概念的省思：何为新，为何新，如何新？》，《苏区研究》2018年第5期；毛升：《不谈毛泽东的中共革命史如何可能？——评李金铮〈重访革命：中共“新革命史”的转向，1921—1949〉》，《二十一世纪》2022年4月号。

学术性可言”^①。一些所谓研究，自说自话，既不考证史实，也不顾及常识，一些问题没有搞清楚也不去做研究。还有一种现象，在一些地方在党史宣传中为了争资源、争利益，不顾史实，在宣传和举办各种展览和纪念活动中，无原则拔高某些事件在党史中的地位，甚至移花接木，造成史实错误。这种做法不仅达不到宣传应有的效果，而且在民众中造成不良影响。没有扎实的、高质量的党史研究，就难有正确的、行之有效的党史教育与宣传。只有建立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才能讲好党史故事。

其次，警惕中共党史研究中乱贴“历史虚无主义”的标签。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仅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是有危害的，对党史研究也是有危害的，不利于总结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不再赘述。在这里笔者想说的是另外一种值得警惕的现象。中共党史研究与古代史、近代史研究完全不同，党史不仅是历史研究，也涉及到政治问题，才有了“宣传有纪律，学术研究无禁区”的原则。但在近些年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走极端的现象，即“历史虚无主义”成为党史甚至历史研究中可以任意贴的“标签”，其特点是无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史实，而是只看是否符合自己所谓的“史观”和“世界观”，只要不合自己的口味就贴上“历史虚无主义”的标签。于是一些真正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论著、理论方法被贴上“历史虚无主义”的标签，即便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框架下的党史研究，也不能幸免。笔者认为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异化，是另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是党史研究中的乱作为与不作为，需要高度警惕。如果任由乱贴“历史虚无主义”的标签，既不利于深化党史研究，又不利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党的建设。

再次，党史研究归根结底是“史学”研究。建党100周年之际，关于党史学科属性进行了有益的讨论，有学者指出：“只有将党史归属历史学，将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扩大为‘大党史’，才能改变传统党史学者的局限，保证学术性与政治性的统一”^②。党史研究顾名思义是“党的历史”的研究，属于史学研究的范畴，就要遵守史学研究的基本法则。如对事件的考证、资料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人物的评价等，都应符合史学研究的规范。目前一些党史研究“成果”几乎没有史料支撑，满篇空话、套话，充斥着八股气息，堪称“新八股”文风。写这样文章的人，既没有花时间去档案馆去查资料，即便已经编就的党史文献也不愿意花时间看，东抄西抄，按所谓“套路”写文章。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针对延安时期党八股文风，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给予有力的鞭挞。他说：“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副对子说：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毛泽东针对延安时期党八股文风的批评，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党史研究中，应该坚决拒绝“新八股”文风，开展具有真正史学价值的党史研究，这才是党史研究的出路。

（本文作者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西安 710119）

[责任编辑：王昌]

① 李金铮：《中共党史回归历史学科的正当性》，《江海学刊》2021年第4期。

② 李金铮：《中共党史回归历史学科的正当性》，《江海学刊》2021年第4期。